

中文摘要

“礼乐治国”一直是中国古代儒家心中关于国家治理的理想方式。至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儒家群体开始呼吁“托古改制”，并在朝野之间掀起一股风潮，这些呼声也使得当时的西汉统治者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在此背景下，王莽的出现引起了局势的转变。他通过推进制礼作乐以解决时下的社会问题，以满足儒家的诉求。通过制礼作乐，王莽不断地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声望和政治地位也逐步提升。本文旨在探究王莽在乐制改革中各项措施的政治思想来源以及政治现实需要，分析乐制改革在王莽政治生涯中产生的作用。具体而言，本文将探讨王莽乐制改革的政治目的，探究其政治思想来源和实现途径，以及分析乐制改革在政治生涯中的意义和影响。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对王莽奏立《乐经》以及实施的相关举措进行分析。《乐经》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其散佚成为了汉代统治者制礼作乐的一大阻碍。本文首先对《乐经》的散佚以及此后儒生恢复《乐经》的种种努力进行梳理；其后对于王莽所奏立的元始《乐经》的相关成书问题进行梳理；最后试图从王莽奏立《乐经》的意图方面出发，以此讨论王莽重新奏立《乐经》与其希望打造的周公形象的联系。

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对王莽时期乐制改革的相关措施进行分析。首先是王莽对郊祀乐制进行了调整，在恢复南北郊祀制度的基础上，以《周礼》记载作为郊祀礼的规范。其次是从王莽所作《新乐》之名称、使用场所、创作意图的角度入手，分析在王莽逐步构建其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音乐在当中产生的相关影响。最后是通过东汉制礼作乐过程中对于“汉家故事”的采用进行分析，以此看王莽乐制改革的成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第三部分对王莽与民间音乐的互动情况进行分析。首先论述了王莽通过使者循行的方式，从舆论的角度完成太平盛世的叙述，进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其次论述了西汉末年雅俗乐矛盾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王莽进一步抑制俗乐、推广雅乐以整顿社会风气、塑造理想秩序的种种措施。最后，古代思想中对音乐的教化作用极为看重，本文通过论述王莽关于广施教育、采风纳歌等活动来实现为社会移风易俗的理想，讨论这些举措在王莽政治生涯前进道路上起到的作用。

本文的第四部分对王莽与乐官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汉代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套天道秩序与人间秩序相呼应的理论系统，其具体表现则是“由律及历”再到度量衡等各项社会制度。本文分析了乐律思想在天人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论述了王莽重用刘歆进行考订乐律的工作以此来建设新的国家秩序的各项举措。此外，本文论述了在图讖盛行的西汉末年，王莽何以任命“说符侯”崔发为来担任讲《乐》祭酒一职，说符侯的身份又如何为王莽的代汉行为提供相应的合法性解释。

王莽从恢复典籍、改良制度、移风易俗以及重用乐官四个方面对西汉末年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儒生群体关于建设“礼乐之邦”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动力，也为王莽政治生涯的迈进提供了基础，为王莽自身的权威和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来源。

关键词：王莽；制礼作乐；政权合法性

目 录

中文摘要	1
ABSTRACT	3
绪论	7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1
一、 汉代音乐制度的相关研究	1
二、 王莽改制相关研究	4
第一章 王莽奏立《乐经》与周公形象的塑造	10
第一节 《乐经》的消亡以及汉儒眼中的《乐经》	10
第二节 元始《乐经》的订立与周公形象的塑造	15
一、 元始《乐经》作者及载体性质	15
二、 王莽奏立《乐经》以及周公形象的巩固	18
第二章 王莽改革祭祀用乐与理想统治秩序的建立	21
第一节 西汉末年王莽对郊祀用乐的改革	21
第二节 《新乐》的制定以及新莽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27
第三节 “元始故事”视野下王莽的乐制改革	31
第三章 王莽“扬雅抑俗”与太平盛世的期盼	34
第一节 郡国采风以及王莽名望的积累	34
一、 循行制度与采诗活动	34
二、 元始四年采郡国歌谣	36
第二节 王莽“扬雅抑俗”与推动社会教化	38
一、 雅俗乐之争以及王莽“扬雅抑俗”	38
二、 乐教思想以及王莽广施教化	41
第四章 王莽重用乐官与礼乐治国理想的达成	44
第一节 羲和刘歆的任命以及王莽治国构思的实施	45
一、 由律及历再到度量衡看儒生心中的理想国家	45
二、 王莽任命羲和刘歆以及新国家秩序的形成	48
第二节 崔发讲《乐》与王莽政权合法性构建	52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目的

“礼乐功成”是古代儒家一直追求的政治理想，象征着他们心中理想国家的形成。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乐制不仅与礼制相互依托，而且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独特属性影响国家秩序的构建。此外，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时刻受社会变迁和时人思想变化的影响。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音乐制度成为协调不同社会群体，诉诸合法性来源的工具之一。

西汉礼乐制度中隐藏着许多问题，在受秦朝以及民间乐曲发展的影响下，到西汉末年开始爆发。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西汉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逐渐受到儒家群体的质疑。王莽作为其中的一员，以“制礼作乐者”的身份纠正了当时各种社会问题。通过对音乐相关制度的改革，他使各项礼制的设定更符合儒家经典所描述，并以此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同时，制礼作乐也逐渐成为了王莽获取政治利益的有效方式，其成果还影响了东汉初年的礼制建设。王莽时期作为西汉和东汉的过渡阶段，其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又深刻影响了之后王朝在相关制度塑造的思路。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王莽时期对于乐制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探究乐制如何影响国家秩序的形成。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作为西汉与东汉的过渡阶段，王莽时期的各项改革措施以及产生的影响在学界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课题。在音乐方面，王莽在西汉音乐制度架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儒学化的改造，以达成制礼作乐的政治成就。因此，若要对王莽时期作乐的逐项措施进一步了解，我们需要对学界关于汉代音乐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此外，王莽改制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制礼作乐则是在王莽的整个改革构思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也应该对学界关于王莽改制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礼制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认识，以了解王莽改制的思路、方式以及影响。

一、 汉代音乐制度的相关研究

受困于历史材料的局限，关于王莽时期乐制改革的内容不同于其礼制改革内容

的丰富，大多存于史料的只言片语当中。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王莽时期的作乐情况，需要从汉代的音乐系统开始探究。

关于汉代雅乐留存问题。自秦火后，钟鼓雅乐的保存情况受到很大的打击，人们所掌握的古乐资源非常有限，大部分都是以周、秦风格为基础创作的。这些乐曲以钟鼓乐为主，主要集中在西汉前中期。李荣有结合图像学、艺术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详细叙述了汉代的金石乐器和鼓类乐器，对学界一直以来关于汉代无“雅乐”的判断进行了再思考。^①王子初通过将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以及《汉书》中所载西汉初年叔孙通作乐内容进行对比，认为在叔孙通的主持下，西汉初期确实建立并推行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礼乐制度。^②张闻捷对苏州大云山一号汉墓、山东临淄稷山一号汉墓、江苏徐州子房山汉墓等多个墓葬的考古资料推断，汉代中前期的一些乐钟排列依旧沿袭了东周时期保留下来的习惯，认为汉儒依旧是了解周代用乐规则的，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用乐标准使得汉代人模仿的古乐版本各有不同。^③

关于汉代乐府。《汉书·礼乐志》曾记载武帝时期“乃立乐府”，其后随着考古研究的发现，乐府机构于秦已经出现，这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认为，《汉书·礼乐志》中提到的“乃立乐府”并非为颜师古所注的“始立乐府”，应为对乐府编制与职能的扩充。^④王福利则认为，武帝立乐府的行为实际上是将乐府所掌的音乐内容发生了变化，使乐府的职能从先前的保存乐器、辞章逐渐转向为礼乐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当中。^⑤许继起通过汉代的典章、职官、制度等方面对汉代乐府制度做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在哀帝罢乐府一节对当时所裁乐人的地域、职能、音乐类型都做了仔细的分析，是帮助后面研究者了解汉乐府制度重要成果。^⑥萧涤非对汉代乐府诗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是对历代乐志中常被忽视的民间乐府诗类加以详细叙述，使得后人对于汉乐府研究的视角更加丰富。其关于“汉乐四品”的看法也为众多学者所用。^⑦

关于汉代音乐思想的相关研究。随着天人感应思想在武帝时期的逐步发展，音

^① 李荣有：《两汉钟鼓之乐与礼乐文化图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 王子初：《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文物》，1997年第5期，第27-33页。

^③ 张闻捷：《汉代乐钟编列制度初考》，《文物》，2018年第3期，第25-36页。

^④ 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第36-37页。

^⑤ 王福利：《汉武帝“始立乐府”的真正含义及其礼乐问题》，《乐府学》，2006年第1期，第41-45页。

^⑥ 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扬州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⑦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乐作品的创作也深受其观念的影响，渐渐形成了汉代音乐的一个显著特征。郑明璋中对汉代的时空观念与神话、仙话对汉赋艺术特征构成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汉赋的生产不仅受到儒、道、仙多种思想的影响，而且对于当时时空环境的描述也产生了新的文学特征。^①孙昕姣、朱存明指出，汉代人在多种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运用传统文学当中“兴”的理念，以此在精神观念中突破生命有限性的约束，构建时人的精神世界。^②韦具旺对汉代音乐中调式、乐器以及乐律所体系的文化含义进行分析，以此探究汉代音乐与当时的讖纬观念、天人观念以及天文演算等政治文化制度的联系。^③汉代的音乐与历数、数术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孙小迪通过对《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以及郑玄对《周礼》的注解等文献进行解读，以此分析汉代乐律中所体现的天人观念，认为先秦哲学中包含的天地、五行、阴阳、等观念占据了汉代音乐思想的中心。^④

关于汉代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刘力、李烁对叔孙通制定朝仪的过程进行回顾，以此分析礼仪性的制度建设在西汉初年政治秩序建立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⑤谢谦则将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汉儒发起的大规模的兴复古礼运动进行分析，以此考察礼制建设的思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的联系。^⑥刘建锋对“郑声”，即民间俗乐在宫廷的盛行进行考察，以研究在汉代社会经历转型、改革和发展时，人们的文学价值取向。对于儒生来讲，“郑声”与儒家思想断然违背，因此也多次发起批评，以维护儒学在王朝思想当中的正统性。^⑦

学界关于汉代音乐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无论是从音乐制度、音乐形式、音乐思想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是其目光大多聚焦在高祖刘邦与武帝时期，这也是碍于汉代所流传下来的相关记载所献，但这些成果同样为本文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① 郑明璋：《汉文化视角下的汉赋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孙昕姣、朱存明：《从汉〈郊祀歌〉与汉画像看汉代人的诗性力量》，《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52-57页。

^③ 韦具旺：《汉代经学视野下的乐与传统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孙小迪：《以气论乐，以律论天——气论哲学时域下的汉代乐律思想辨析》，《中国音乐》，2021年第5期，第208页。

^⑤ 刘力、李烁：《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5-36页。

^⑥ 谢谦：《汉代儒学复古运动与郊庙正乐的正统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49-55页。

^⑦ 刘建锋：《两汉“郑声”的阐释与接受》，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二、王莽改制的相关研究

1. 民国时期关于王莽改制的研究成果

吕思勉先生将新莽时期的治国措施分为五项，即“均贫富”“兴教化”“改官制”“修庶政”“兴学术”。然而王莽所施新政要么未能实施，要么未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吕思勉先生认为其弊端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虽亦欲行督责之术，而不知社会组织不变，党类利害相违，弊端终将百出无已，断非督责之术所能补救也。”^①其所立制度，“皆慕古而不切实际”^②。吕思勉先生从新莽的各项措施之得失着手分析，认为王莽改制的思潮实际上是“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因此改制的失败也“皆非一人之责也”。^③吕思勉先生并未单以王莽改制的具体措施进行论述，而是结合了先秦以来儒生群体的政治抱负，对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进行评价，为王莽改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长时段的思想背景。

钱穆先生对汉代儒术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自昭宣以下，汉代的儒术风气日益见盛。由此前的“儒术所以见尊，亦自吏事”^④逐渐转变为“盖非经术士，即不得安其高位”^⑤，学术风气的转变为王莽改制提供了思想基础。钱穆先生在评价王莽改制措施道，“徒知慕古，不通物情”^⑥“奉行之不得其人”^⑦“一意孤行”^⑧等，可见王莽改制措施之迂腐。钱穆先生结合西汉中后期盛行的儒术之风认为，汉儒高谈灾异以致于荒诞，而谈礼制又往往致于拘泥。王莽的改革措施两皆有之，也导致了新政的失败。

翦伯赞先生认为王莽改制之关键实则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即打击商人地主势力、抑制土地兼并、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等。王莽推崇复古运动，将《周礼》作为自己改革的旗帜实际上是在利用名教为自己的改革运动做掩护。如果离开“祖刘”的立场，王莽“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⑨。翦伯赞先生新颖地将视角从以外“祖刘”的思维定式当中抽离出来，从新莽时期各项经济制度进行分析，为后人

^① 吕思勉著：《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6-217页。

^② 吕思勉著：《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5页。

^③ 吕思勉著：《秦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2-203页。

^④ 钱穆著：《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08页。

^⑤ 钱穆著：《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1页。

^⑥ 钱穆著：《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20页。

^⑦ 钱穆著：《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24页。

^⑧ 钱穆著：《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25页。

^⑨ 翦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王莽改制的相关研究

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为王莽改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郭沫若先生认为，西汉末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这一时期社会危机逐渐加剧，在此背景下，地主阶级推举王莽走上王位以化解阶级矛盾。然而王莽诸多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例如在土地问题上，郭沫若先生认为“当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根深蒂固，企图推行‘王田’制度，显然是历史的一种倒退；而且，由地主阶级掌握的各级政权也根本不可能推行这种限制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制度。”^①在这种情况下，新莽政权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新莽政权就这样沉默在历史当中。

孟祥才先生对王莽及其背后的豪族地主集团进行分析，认为王莽所订立的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与豪族地主阶级在利益上产生了分歧，然而王莽本人依旧深受豪族地主阶级所带来的影响。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封建统治者“解决和缓和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的能力却是十分微弱的，他们活动的余地是狭小的”^②。

李鼎芳先生对于王莽时期施行的土地制度、货币制度等政策进行分析，认为王莽关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是能察觉到一些的，然而其本质“是一个大的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惟一的目的是剥削和搜刮，巩固他的统治，使人民加深了痛苦。”^③

3. 改革开放后王莽改制的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后，关于王莽改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其切入的视角也逐渐多样化，关于王莽礼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也逐渐涌现。

阎步克认为，士大夫群体的诞生与发展中一直包含着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根基，二者无法根除彼此，只能以对立统一的关系延续下来。因此他从士大夫群体的发展视角叙述，认为整个西汉王朝处于由“霸道”至“王道”的思想变迁当中，而“霸王道杂之”的“汉政”不符合西汉儒生的政治追求，因而催生出以“奉天法古”为

^① 郭沫若著：《中国史略》（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② 孟祥才著：《王莽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7页。

^③ 李鼎芳：《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第12-13页。

口号的王莽“新政”。王莽的“新政”代表着西汉末儒生群体对于“周政”以根基的理性主义逐渐压倒以“秦制”为根基的实用主义。^①这解释了为什么王莽改制一度饱受赞誉但最终无法坚持下来的根本原因。

李光霁认为，西汉末年统治者对外戚专权的妥协以及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放松态度成为王朝统治下的潜在危机，其中以外戚专权尤为危机。此时的帝国需要尽快地恢复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而此时儒学的发展以及外戚身份为王莽加入到改制工作当中准备了条件。^②

赵昆生、王艳楠、周晓红对汉代统治思想进行分析，儒家思想武帝一朝后正式成为西汉的统治指导思想，在王朝的更迭发展过程中，儒学思想不断地调整与变化以确保自己的指导地位。在儒学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些错位和混乱，而新莽时期恰好处在了这一过程当中，社会对儒学的推崇让王莽“救世主”的身份愈发显赫，同样地，对儒学的狂热也成为了新朝覆灭的重要原因。^③

周金泰基于王莽时期围绕时令在礼仪和职官等多种制度的改革进行分析，有关“时令”的相关理论最早出自阴阳家一派，西汉末年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天道”则成为古代王朝的合法性来源。经过王莽的改造，时令思想作为天道的自然化展现，被纳入到儒家经典轨道并纳入到相关制度的实践当中。^④

王莽改制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庞杂，从祭祀到货币政策无所不包，并且各方面制度包含在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当中。其中礼制改革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这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随着几年来考古技术的逐渐发展，许多王莽时期的考古资料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

王柏中对两汉时期祭祀典礼的分析总结尤为全面，从郊祀、庙祭到社稷的设置与发展流变，从祭坛神位到祭祀流程再到祭祀中的相关事务，其研究中均有涉及，其研究成果在一般意义上超过了“祭礼”的范畴，逐渐形成了以祭礼为线索的、系统性的制度研究。^⑤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19-364页。

^② 李光霁：《论王莽改制的历史背景和失败原因》，《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第48-50页。

^③ 赵昆生、王艳楠、周晓红：《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77-82页。

^④ 周金泰：《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和职官改革——从古典国制视角出发》，《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第49页。

^⑤ 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田天将匡衡改郊祀礼与王莽元始仪的制定视作为汉代郊祀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期间，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祠畤归于南郊，国家可以通过行政系统而非天子本人亲自到地方以彰显皇权。郊祀不再仅仅强调诸神的神圣性，而是转向强调天子与神灵的联系以彰显其权威的唯一性。^①

薛茜对王莽时期的明堂制度中的各项仪式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除了遵循典籍外所举行的祭祀和朝诸侯以外，还举办过封爵、授茅土、大射礼等制度，这与此前西汉统治者对于明堂功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②

陈忠锋将认为，礼制的本质目的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巩固君主统治，因此礼制改革也是通向王莽理想政治的根本路径。西汉后期因为多种因素的存在导致郊祀礼制建设过程总是困难重重，至王莽时才得到完成，也正是因为如此王莽的礼制改革运动成为了汉儒一直向往的改革运动的顶峰。^③

王泽欣则从经学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王莽的托古改制运动名为托古，实为兼托古、今文经交织进行，除了大幅沿用《周礼》作为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外，王莽在礼制建设上还为了自己的目的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④

此前学者在回顾王莽时期的礼制改革时多以整个西汉中后期这个较长的时段作为参考对象，顾向明则认为王莽时期的礼制改革与此前的礼制改革有所不同。西汉后期匡衡等人在除改祠畤为南郊改革以外，还进行了反淫祀的工作，而王莽早年在元始改制中虽然也有反淫祀的措施，然而到新朝末年，王莽却“崇鬼神淫祀”，以致祭祀各路鬼神的场所多达一千七百多所，给人民带来的经济负担难以估量。^⑤

刘成纪则对王莽时期的礼制建筑进行分析，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王莽按照儒家思想将此前西汉统治者的“欲望性建筑”转变为“伦理性”建筑；其次，王莽将这些礼仪建筑视作周政复兴的象征，赋予了建筑与建国等同的意义以维护自身统治；第三，王莽通过对建筑、王城、天下的重新命名使得建筑概念从美学问题逐渐转为政治伦理问题。^⑥

^① 田天：《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4-39页。

^② 薛茜：《汉代的明堂制度——兼明堂制度源流概述》，兰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7-38页。

^③ 陈忠锋：《王莽理想政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 王欣泽：《王莽托古改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顾向明：《试论汉代礼制的形成与演变》，《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第73页。

^⑥ 刘成纪：《王莽时代的礼仪建筑与国家重造》，《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9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98001101064006131>